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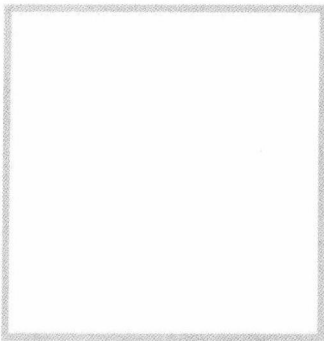
在历史语境中审视

——《新青年》同人
反「传统」问题研究

何玲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历史语境中审视

《新青年》同人反“传统”问题研究

何玲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历史语境中审视:《新青年》同人反“传统”问题
研究/何玲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04-8128-7

I. 在… II. 何… III. 期刊—研究—中国—
民国 IV. 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2947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218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吴立昌

研究“五四”（包括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的专著和论文，近些年来接踵而至，真有点“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它们多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梳理，力图全景式还原历史“现场”，于客观冷静叙述中显示各自对五四运动的态度。除了继续前一阶段反思、质疑五四“激进主义”，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诸如对梁漱溟当年提出的“学生事件赴法庭办理”、“学生去遵判服罪”的主张激赏有加，为复古派代表人物林琴南的竭力辩护，予以全盘肯定，乃至彻底否定五四先贤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等等。不管这些观点怎样的见仁见智，对“五四”研究视域的拓展和反思视角的转换，都是值得欢迎的学术新景观。

本书是作者对其博士学位论文《〈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研究》的增修。何玲华博士经过多年思索和准备，不仅补充了许多重要史料，而且新写了两章，更在不少关键之处深化了原有的论述。她虽能汲取各家之长，注重返回历史“现场”，十分关注相关群体及个人，但又不为时论所左右，而是立论集中，专题性强，以《新青年》以及《新潮》、《每周评论》等为重点，通过对众多五四先贤反“传统”言论文本精

细的解读和缜密的理论剖析，从而得出与当下众说迥然不同的判断。这是本书的特点，也是其现实意义所在。

正如本书书名所强调的，“在历史语境中审视”《新青年》同人的反“传统”问题，因此作者颇策略地一开始就辟专章对“传统”和“语境”作详尽充分阐述，以夯实全书立论之基础。她一方面肯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儒学为主，但还有其它各“家”各“学”；一方面在毫不讳言五四先贤反“传统”确有不少过激之处、个别人还相当严重的同时，仍坚持他们反的主要是儒学中的“纲常名教”，而非其他。如果说因史实俱在，此点尚不难说清，那么讲透“语境”问题则较费力。因为时下论者往往仅从纯学理角度质疑、否定五四先贤的反“传统”，而有意无意忽视历史语境。本书特别强调“不可忽略”陈寅恪提出的“同情之了解”的主张，就是针对这一现象。记得七八年前作者撰写论文时，我恰好因工作之需对“了解之同情”一语做过一点诠释。此语出自陈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凡著中国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可是今日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遗存最小之一部，所以陈氏提出，“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像，始可以真了解”。我们一般理解“艺术欣赏”，是要求欣赏者应具有丰富想象力，并对作为欣赏对象的艺术品注入强烈感情，甚至能与该艺术品的创制者同脉搏共呼吸，以达到二者融为一体的至高境界，才能把捉艺术之真谛。陈氏又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

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处于同一境界”，就是研究者应该为古人设身处地去想，去言，去行，而不是离开古人当时之情境。“同情”“艺术欣赏”云云，盖指此也。所以我们应该领会陈寅恪强调的虽含有艺术欣赏中的感情因素，但更指对历史的客观体认和评说。否则，他为何紧接着警告研究者，“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倘若“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真相愈远。”如将“古代哲学”换成“五四新文化”，不也击中当下学界之弊？我们不应在一味指责五四先贤“激进主义”时，忘却一个事实：陈独秀当年不是像今日学者教授这样关在书斋里撰写全面评价孔子学说的学术专著或教科书。

20世纪90年代学界曾有“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乃不同概念之说。数年前过世的一位大学者认为前者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文化现象之总和，是丰富的、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后者则是前者的核心，其影响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甚至灵魂，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显然这是他根据“纲常名教”、“君道臣节”等儒家思想支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实际状况概括出的结论。所以纯学理研究，一旦离开特定的历史语境，是很难揭示研究对象本相的。研究五四反“传统”，亦复如是。本书第二章谈陈独秀时，已经指出一些论者以陈寅恪的“三纲六纪”说，“作为否认儒学曾以国家意识形态面貌出现的理论依据质疑陈独秀的反孔非儒，则不足为据”，第九章又通过阐释柏拉图“理念”，进一步揭示他们“将‘三纲六纪’抽象为‘和谐意识’，并比

附于柏拉图“理念”的做法存在三方面问题，论证也较有逻辑力量。虽然作者觉得怎样解读陈寅恪这段话，属另一语义层面，所以未作深究，但我还想在此略“究”几句，但愿不是赘语。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的原话：“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我以为，以此为据质疑否定陈独秀的反“传统”，不仅置历史大“语境”于不顾，而且也无视陈氏此文小“语境”——语言环境。其实，“三纲六纪”只是陈氏对中国文化的精练概括，并未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指出怎样认识这“抽象理想”的一条正确路径，因此下文笔锋一转：“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陈寅恪这样讲，不正是提醒人们研究传统文化不可离开其依存的历史语境吗？不是比纯学理抽象化谈论“天人合一”“和谐意识”之类更合乎科学？

强调“语境”还启发我，不仅要重视五四反“传统”的历史语境，而且应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现实语境，这样也许更有利于理解近一二十年“国学热”、尊孔读经、反思质疑乃至否定“五四”等为什么会扎堆而至这一文化现象。虽然经济持续发展，但是各种社会矛盾却有增无减。面对这一客观现实，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前最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改必须迎头赶上。怎么赶？恐怕还非得请出五四先贤力推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不可。传统的精华必须汲取继承，也应当引以自豪，但继承和自豪的毕竟不能代替最需要的，而上述文化现象，至少表明当事者未认清什么才是当下最需要的，它的出现，主要因

十年“文革”的“大革文化命”，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以为要靠复兴传统文化，提升道德，重树民族自信心；而“文革”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追根溯源则来自五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必须肃清其流毒。虽想治病救人，却未对症下药，更忘了一味“主药”。本书作者对一位1988年还为五四精神辩护的论者，没几年便“一变为积极的批评者”的观点大变很重视，因为他是大学者，有代表性；对他在批评陈独秀时的“非‘心平气和’语”很不以为然，“仅用当下书斋中的‘玄想’，置评当年的是非，解构曾经的定见，焉是？焉非？”话虽说得含蓄，但倾向鲜明。如反思“文革”的巴金，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就针对香港某作者关于“五四”的“害处”是“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说法，反驳道：“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未‘彻底否定’……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皆是。”并认为那位作者说的“‘文革’之所以做出这许多令人震惊的事情”，“正是从封建社会学来的，作为十年浩劫的受害者，我有深的体会”。他反复忏悔的就是迷信“神明”，丧失独立思考，不敢讲真话。言外之意当然是呼唤民主自由，但他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主管部门就是不理睬。不久前过世的著名学者任继愈坚持“儒教是教”的主张虽然仍存在争议，但他的“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其宗教根源就是“儒教的幽灵在游荡”的论断是难以驳倒的。

“文革”所有的荒诞，可以说都是在“造神运动”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这究竟应归咎于五四“激进主义”，还是恰恰因完全抛弃“德”“赛”二位先生所致？时代潮流毕竟没有停止向前的步伐。进入新世纪，“科学发展”已成国策，“民主是

个好东西”更得到普遍认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一名言正在不断深入人心。一年多前我在一篇文章里曾将“德”“赛”先生在中国九十多年的坎坷遭遇喻为：“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难呵！当今虽然形势大好，但要“国策”和“名言”真正落到实处，仍然障碍重重。“民主恐惧症”患者，“叶公好龙”现象，并不鲜见。近年来对现代文明的批评，似有昔日大批判架势，就是有力佐证；这与社会上祭孔、读经、拜祖，甚至运动会上也要弘扬传统文化的现象，倒也相映成趣；再加学界趋之若鹜的反思、质疑甚至否定五四，三者形成一股合力。

我一直在思索，这股合力，有无转移民众对“德”“赛”先生视线之嫌。十余年前曾研究过《论语》的一位学者最近也表示，今后不再谈了，“因为讲孔子成了掩盖更重要更必须的东西的手段。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是五四推出来的两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我高度评价孔子，但反对以尊孔的潮流来掩盖现代文明所要的科学民主”。

做“德”“赛”先生下楼的促进派，任重道远——愿与作者共勉。

2009年7月24日

序于沪上四乐居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关于“传统”与“语境”	(13)
一 所谓“传统”	(13)
二 所谓“语境”	(30)
第二章 擎旗“主将”陈独秀	(46)
一 非孔言论,集矢于“儒者三纲”	(47)
二 “同情之了解”,不可忽略的诸因素	(54)
第三章 问孔责儒两“斗士”	(63)
一 率先“问孔”易白沙	(63)
二 “老英雄”吴虞	(75)
第四章 “爆得大名”胡适	(89)
一 揭起文学革命的义旗	(90)
二 鼓吹“质疑”与“不调和”的新思潮精神	(103)
三 对旧礼教等封建道德文化的抨击	(107)

第五章	“双簧”两同人	(113)
一	“用石条压驼背”的钱玄同	(113)
二	“灵霞馆主”刘半农	(132)
第六章	“双子星座”周氏兄弟	(147)
一	“沉默中爆发”的鲁迅	(147)
二	自诩“客员”的周作人	(164)
第七章	激言“二次大贡献”李大钊	(176)
一	批“袁”揭“孔”，护卫“宪法”	(178)
二	肯定东西文明特点，主以“调和”	(187)
三	倡言新文学	(193)
四	妇运先驱	(195)
第八章	特殊“同路”蔡元培	(203)
一	《新青年》杂志发展壮大的重要影响人	(204)
二	《新青年》的“辩护人”与“声援者”	(213)
三	一个“儒者”	(219)
第九章	在历史语境中审视	(231)
一	关于时代潮流与时代精神	(232)
二	关于“儒者三纲”的渊源与本质	(241)
三	关于“同而不同”历史情状	(251)
四	理性面对“国学热”	(258)
	参考文献	(263)
	后记	(278)

引言

众所周知,《新青年》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知识精英进行新文化启蒙与反传统思想活动的主要舞台。从旧道德到新道德、从旧学到新学、从专制迷信到民主科学、从旧文学和文言到新文学和白话,等等,《新青年》见证并记录了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因此,《新青年》也成为认识“五四”、研究“五四”的重要文本;当然,它也成为有关“反传统”问题讨论的重要原典。自进入新时期之后,有关“五四”反传统的再认识再评价问题,随着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反思的深入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再度凸起,而纷论不休。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潜沉已久的“国学热”以极为罕见的自下而上的姿态,迅速升温并如火如荼四下蔓延,有关以“反传统”为特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度凸显。对此,重返《新青年》现场,再现《新青年》风貌,历史而具体深入地考察与揭示《新青年》同人反传统的精神样貌与特质,其意义不言而喻。

—

《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初名《青年杂志》，主撰陈独秀。因刊名与当时上海青年会的《上海青年杂志》相近似，招致纠葛，在发行人群益书社陈氏弟兄的再三劝说下，陈独秀始将《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更名为《新青年》，该名称一直沿用至1922年7月1日终刊。兴许是因为诞生于风云际会的民国之初，《新青年》之“变”，继“刊名”之后，其编辑形式和著者队伍也在不断地“变化”。应蔡元培的邀请，陈独秀1916年抵北大长其文科，《新青年》1917年正式迁到北京，同年8月出至第3卷第6号，休刊四个月。其间，陈独秀一直为主撰。至1918年1月复刊，出第4卷第1号，开始实行编辑集议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鲁迅等参与编辑会议。1919年1月，改行轮流主编辑制，从第6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1920年夏，陈独秀到上海筹建共产主义组织，杂志社也随之迁回上海。从同年9月初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仍由陈独秀编辑，1922年7月第9卷第6期休刊，共刊出9卷54号。

编辑方面如是，著者方面也颇相近。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一书中，对此方面的情况有着较早的研究与揭示。即：（1）上海创刊时期：首卷主要撰稿人陈独秀之外，还有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高语罕、潘赞化、谢无量等，从著者相关情况来看，《青年杂志》最初是一份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的同人杂志，且相互间有共事革命的背

景。第2卷著者除原有之外，新加入的撰稿者主要有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杨昌济、马君武、苏曼殊、吴虞、陶履恭、光升、吴稚晖等，这些新加入的著者，除少数为皖籍人士外，大多为外省籍。也就是说，从第2卷起，《新青年》已突破了皖籍作者为主的局限，但“圈子”色彩仍浓，大都有留学东京或从事革命的背景，并大都曾是《甲寅》杂志、《中华新报》的编辑或作者。（2）北京时期：新加入的著者主要有章士钊、钱玄同、蔡元培、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鲁迅、王星拱、恽代英、常乃德、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林玉堂、俞颂华、欧阳予倩、朱希祖、陈衡哲、李剑农、李次九、任鸿隽、王光祈、周建人、陈启修、杜国庠、潘力山、张慰慈、张崧年、孙伏年、高君宇、戴季陶等。较之以往，这一时期加入《新青年》的著者情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除鲁迅及个别人外，大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学生以及全国各地较活跃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如此情况至少说明三方面问题：陈独秀进入北大之后，《新青年》迅即成为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反过来，《新青年》因北大教授的加盟，声势更盛。相对于倡导者而言，五四时期年轻一代的加入，不仅示着《新青年》唤醒青年初衷的实现，也揭示了新文化倡导力量与新兴革新力量的结合，是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的原因所在；同时还揭示了《新青年》对全国革新力量的吸纳，之于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鼓动与兴起的意义。（3）南迁返回上海时期：该时期的《新青年》已成为倡导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刊物，著者面目一新，主要有李季、李汉俊、扬明斋、周佛海、李达、沈玄庐、沈冰雁、陈望道、沈泽民、陈公博、成舍我、施存统等，皆为社会主义信仰者。鲁迅、周作人、胡适、陈衡哲、沈兼士、蔡元培、朱希祖、王星拱、周健

人等也时有撰述。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进行,《新青年》著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富于变化。但是,就其主导力量而言,其“同人”共性相通的一面令人瞩目。首先,他们与辛亥革命的革命知识分子同一时代,同处于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环境,有的甚至本来就是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并具有适逢其会历史仅见的教育背景,既经历过系统的传统训练,又吮吸了近代西方思想的滋养,新旧学问兼备,中外影响集于一身,对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皆更易产生敏感和心理冲突。其次,相对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们有着更为浓重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性格特点,思想上更注重文化价值的取向。但同时他们大都仍是政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与清末和民国间的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他们集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于一身,皆是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①

李泽厚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指出:“经由庚子之后大批留日学生的涌现,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层开始向近代行进和转化,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而且也开始在感情上和心态上。”“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续。”^②或者说,尽管心向“西学”,但他们忧国忧民思想和情绪及其对伦理道德的强烈关注,与历史上所表彰的士大夫并无二致,只是相关的内容不同罢

①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2—183页。

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211页。

了。作为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始终被近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纠缠于一身。如果不谙《新青年》同人“近代知识分子”的共性特征，在相关问题的解读过程中，难免不出出现误读与困惑。

二

《新青年》的创刊，虽无冠冕堂皇的发刊词，而且因其涉及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众多，实难一以概论。但是，刊于1915年9月15日首期的《敬告青年》和五四前后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与《本志宣言》等篇目，对《新青年》基本的精神有着较为充分的揭示，历来为论者所重视。《新青年》对传统文化态度，也尽显其中。

《敬告青年》^①，因其率先揭示了《新青年》所蕴含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基质，素有不是发刊词之发刊词说。其精义在于，为“敏于自觉与奋斗之青年”所提出的“六义”主张，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具言之：它首先对传统文化重整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的家庭本位所导致的国民之“奴性”加以批判。认为人生而平等，绝无奴隶他人的权利与自处奴隶地位的义务；传统的忠孝节义、轻刑薄赋、称功颂德、拜爵赐第、丰碑高墓，等等，皆为“听命他人”的“奴隶”之所幸，在倡人权平等、脱“奴隶羁绊”的时代，已“非血气所忍受”。其二，认为“世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界进化，駸駸未有已”，固步自封，无异于自摒于20世纪世界之外，自困于“奴隶牛马黑暗沟中”，主张与时俱进善变图存而“不惜国粹之消亡”。其三，认为“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化民成俗亦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传统隐逸的思想正是东西民族强弱的渊藪，主张效欧俗“横厉无前”和孔墨进取有为。其四，认为当今万邦并立的世界，动辄相关，一国兴废存亡半在内政，半在国际，笃旧速亡善变因进，莫能违之，主张世界意识反对“锁国”陋见。其五，指斥儒家礼教文化崇尚虚文脱离生活导民于虚妄。主张效欧洲“举凡政治之所崇，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其六，斥主观想象张客观理性。认为传统思维模式偏于直观想象，有假定无实证，导致蒙昧浅化；科学则综合客观诉之理性，近代欧洲优越于他族，科学之功不在人权说下。显然，《敬告青年》对传统文化的指斥始终与民族存亡、时代进步紧密联系，且始终以欧洲近代文明为尺度。这一思想特征一直贯穿于《新青年》，并随着社会新旧矛盾和东西文化碰撞的加剧而日益深入与凸显。

刊于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社会攻之以“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之“罪状”，直认不讳；但坚称其“本来无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为此，“一切的